

## 一九五七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

Directories of the Victims suffered from the 1957 political persecution by the CCP

### 前言：这部“大辞典”实在太沉重

武宜三

最近十多年，我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坐在电脑前，整天整天地整理密密麻麻的1957年受难者的资料；一叠叠沉甸甸堆在桌旁的书籍、报刊，手稿，常常令我陷入沉思。

这几万个姓名的聚合，源自60多年前那场民族历史上对知识分子最大规模的持续多年的剿杀。每个姓名的背后都记录着一条鲜活生命急转直下的悲惨轨迹。如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不在人世，并且，正如加害者所希望的那样，他们所经历的被欺凌、被残害甚至被杀戮的事实，已在六十余年岁月风雨冲刷中越来越模糊。青年学者孙陇先生说：“搜寻他们的苦难经历，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忘殉难者，是当代人的一种责任。”

说到对生命的态度，美国最值得赞许，不仅公布历次战争死亡人数，并且精确到个位数（如越战死亡58,209人，韩战死亡36,574人等），“9.11”事件的每年纪念日，遇难者的名字都会被一一朗读；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每一位死难者都有名有姓；以色列人也为大屠杀死难者修建了一个大型纪念馆。

反观吾们贵国，实在不敢恭维。国共内战中共军的死亡数字拿不出来，平民老百姓伤亡情况更不用说了；抗日战争死亡人数，究竟是“百万”还是“千万”，搞不清楚；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刚刚好30万，都是谁呢？对不起，名单不存在！天灾人祸、政治运动的死亡人数，早已成为国家“机密”，比如，收集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死者名录的志愿者被安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投入监牢。

被“蚂蚁化”、“简单数字化”也是中国的传统，“秦坑赵卒四十万”便是一例！然而，历史不容遗忘，生命尊严不容忽视，更何况1957的受难者们至今没有得到任何经济上、精神上的补偿！用一句轻飘飘的“扩大化”，一张傲慢的“改正”通知书，如何堵得住天下悠悠之口！

这部“大辞典”是在档案被封锁，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通过报刊、书籍、互联网、民间访问，一个一个收集起来的，十多年辛苦不寻常！如今已经有近4万个条目（即右派分子个案），图文总量超过一千万字。尽管离实际数目还非常遥远，但毕竟已经让很多五七老人和他们的后人看到了星光！

权让它来填补中国没有受难者名录的历史空白吧！希望它不仅仅是数据库，

工具书，也不仅仅是纪念册、纪念碑，而且是五七受难者们的灵魂归宿，当然也供后人祭祀、追思、纪念。

也就是它承担着警示子孙的重任：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运动，千万不能再重演了！

### 右派，到底有多少？

在 1957 年那场“反右”人祸中，毛泽东、邓小平、彭真和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到底把多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人士推下陷阱，家破人亡？又有多少家属亲朋被牵连落难？由于档案封锁，至今还没有确切答案，但是从全国省市县地方志和各种资料透露出来的信息中，我们可以做些基本测算：

以中央国家机关为例，1957 年 7 月 20 日的统计，61 个中央国家机关单位参加运动的 175,438 名人员中，划出右派分子 2,517 名，占总人数的 1.43%。按中国当时总人口 6.47 亿计，全国右派分子大约 928 万。而这仅仅是运动刚开始，后期又有很多人被“补划右派”，当然，国家机关知识分子多，右派分子“浓度”相对高些。

以不算很左的湖南省的衡阳、道县、常宁等市县右派比例推算，全国有右派 300—1,000 万之间，云南、黑龙江等省市的比例较低，但按比例推算，也有一两百万之多。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省肇州县中学把 9 位高中学生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不许参加高考、报名参军，只能回到农村接农业受劳动改造；而他们仅仅是要求将母校高中部并入肇州一中。安徽省宿县全县 3,100 多名教师有三分之一被划为右派分子。对校园痛下杀手，对本来就落后的文化教育打击尤大。

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各省会城市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右派比例高。1957 年 12 月底止，经北京市各级领导机关审查批准的右派分子就有 7,787 人，其中极右分子 1,779 人。《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3 日《北京市一批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一文中承认，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有 715 名，未戴右派帽子却受各种处分的有 842 名。这些数字都是被缩小了的，因为仅仅 1958 年从中央机关一机部、文化部、教育部、商业部、外交部、建工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侨委、中央气象局、新华总社、对外文委等军委各部被送去北大荒的右派份子有 1,417 人，文化部就有 400 多人。部队等其他系统，以及北京市机关、工厂企业、商店和大中专学校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右派分子还没有统计在内。冶金部有色金属工业综合研究所职工约 300 余人，有 49 个右派分子。比例约 14%，确实是战绩“辉煌”，“超额”完成了“抓右派指标”。上海市光明中学把 28 个半教职员打成右派分子，在 90 多位教职员中占了 20%以上。

河南省比较“左”，连中共省委书记潘复生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全省共划右派分子 9 万人，占省人口总数 4,840 万的 0.19%。漯河高中在教师中“深挖右派”的同时，又在学生中划了 37 名“右派分子”，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精神不予批准，中共校支部书记竟将这些学生全部划为“坏分子”，开除、送管制劳动。另外，还有百余名学生因为在“鸣放”中有所谓错误言论，受到党纪、团纪和政纪处分。

邓县教师“划右率”高达 44.31%。中共中央规定不在中等学校学生中整风

反右，但永城师范 445 名学生中还是划了 115 名右派分子。反右派运动后，永城农村成“光腚村、光腚路、光腚人、光腚户，活着的人像鬼，有的死人没人抬入不了土。”全县暗地外逃者 10 余万人。南阳市七中 35 个教职员划了 23 个右派分子，比例高达 65%，学校语文、数学，生物、理化，政治教研组的干部和老师几乎全部成了右派分子。南阳市第六小学 18 个教师和公职人员，有 11 个被划为右派分子，占总人数的 61%。

河北省抚宁县右派分子不多，却独创了“降点右派”这个新品种。“阎王不嫌鬼瘦”，区区一万人的青海小县甘德也打了 81 个右派分子，而且品种齐全。

宁夏自治区陶乐县是全国最小的县，到 2015 年也不过 32,000 人，但也打了右派分子 27 人，中右分子 45 人。1958 年，在“消除反党集团在本县影响”斗争中，打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4 人，蜕化变质分子 1 人。1959 年，反右倾主义运动中，打了右倾主义分子 1 人，93 人受到批判。1960 年，双反运动（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坏人坏事）中，关押审查了 300 人。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 1957 年反右派后，1961 年“整风整社”、“整党”又整出“错误干部”几百人。1969 年成立项目组，在全旗先后挖出“新内人党”及变种组织“红党”、“蓝党”、“青党”、“缓民党”、“革共党”、“大众党”、“百人大队”、“绿林反共军”、“蒙藏委员会”等 19 种。

广东及南方各省除抓“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之外，还打了数字庞大的地方主义分子；民族地区还抓“民族主义分子”。浙江省、福建省、广西自治区、云南省、四川省都是抓“地方主义分子”最起劲的地方。

安徽省包括中共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中共省委委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椿，中共省委委员、副检察长李锐等在内，有 31,472 人打成右派分子，是浙江省的 2.3 倍。另外还打了 7,500 人反社会主义分子。因为当时专门的劳教场所少，绝大多数人被送往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和已经判刑犯人关在一起，被管教干部统称为“三类人员”（劳改犯、劳教分子、刑满就业人员）。阜阳地区右派分子 6,180 人，四种人 2,524 人（中右、疑似右派、右倾、反社会主义分子）。因右派问题株连的 5,585 人（7,668 件）。占人口比例 1.234%，按此比例全国 798.7 万“四种人”。

关于右派分子和其他分子的人数，现在流行的“右派分子 552,973”或者简称“55 万”说法，是当局在 1978 年所“纠正”的数目 552,877 人加上不予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 96 人之和，这是被极大“缩水”的数据，因为不予纠正的绝不只 96 人，例如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当时宣布不予纠正、平反的就有 21 名。1978 年后，各地仍然在继续“纠正”，但是绝大多数由于人员死亡、失去联络、档案被丢失或销毁，甚至因为非法无序操作而完全没有档案等等，并没有被统计在内。

比如，浙江省嵊州崇仁中学老师梁丽英，档案中有右派材料，可单位不把她当右派分子。1979 年收到改正文件时才知道自己是右派分子。江苏扬州著名评

弹演员黄异庵，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青海劳改；1979 纠正时，档案里却查不到他的大名。甘肃省敦煌研究所画家毕可，是资格非常老的“老革命”，据说他因为对所长常书鸿夫妇不尊重或者“看不起”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被折磨致死。多少年后一查，他的档案还在常所长文件柜里睡大觉，原来上级没有批准他为右派，把档案退了回来。这个毕可在不在这 55 万里面呢？

实际上，除了右派，还有中右、右言、内控、右倾、疑似右派等“分子”，从“右派言论”引出各色“分子”和“未戴帽而受处分”者；以及因“同情”、“划不清界线”等罪名被株连的一大批人。如果都算上，数字将更加惊人。现在，认可度较高的数据是“120 万—310 万之间”。香港《争鸣》杂志称“解密的中共中央档案”透露说，右派总共是 3,178,470 人，还有 1,437,562 人被划为中右分子，官方既未认可也未反驳，算是默认吧，之后这个数字就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引用。

### “反右”到底多荒唐？

反右派运动本来是违反《宪法》、于法无据的“政治运动”，但是在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指挥下，在唯上、唯左、嗜杀成性的邓小平督办下，打右派，根本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没有任何法律手续。

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上厕所划为右派的怪事并不罕见。山东益都县职工团委系统分配了一个“右派指标”，大家开会到深夜也没法确定，县城民办中学物理老师杨文祥那天正好闹肚子，中途出去上了个厕所，回来就成了右派分子。因为有人说他说了对农村合作化不满的话。

再比如，祖籍四川广安的刘家政，1949 年参加共军到湘西剿匪荣立一等功。1951 年入朝作战荣立二等功。1953 年复员后，考入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物理系。1957 年，单位上 2 个右派指标让领导头痛，那天开会说好不找出 2 名右派不散会，大家只好守着、熬着，从早拼到深夜，既没参加鸣放、又没右派言论的刘家政实在憋不住，跑去趟厕所，回来一顶右派帽子就给戴上了。

胡君（张先痴妻子），因证明丈夫张先痴不是右派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曾彦修因不愿把部下打成右派以完成右派指标而把自己打成右派分子；

陈宗海，因毛岸英死在朝鲜，认为毛泽东一定很悲伤而给报纸上的毛泽东照片画了几滴眼泪，被打成右派；

陶渭熊，因写信揭发家乡一生产队长霸占、奸污女地主，被以诬告干部的罪名打成右派分子（令人不解的是，被陶渭熊揭发的该名队长已经被开除中共党籍，何为“诬告”？）

韩复榘次子韩子华因单位完不成“右派指标”，为凑数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廖经天，因说了“苏联红军拆走我东北工厂机器设备”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袁国英因开会打瞌睡，醒来见别人在发言，便习惯性鼓掌以示礼貌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陆清福被打成右派分子，则因为他什么也没有说，纯属“莫须有”。

秦兴民农校毕业，分配云南省泸西县人民政府。中共县委整风办公室叫他将

9 名右派分子送去卧龙谷农场劳教，却开了一张送 10 名右派分子的介绍信，结果也被当作右派分子留在农场劳动改造……

当然，匪夷所思中，更有荒唐得让人发笑的。河北省庆云县小学教员李天民回忆说，当地一个小学老师在整风反右“集中营”中集中学习后，认为自己的思想比右派分子更落后，于是自动申请当右派分子。可惜这个被称为“投降右派”的人没有留下姓名。

上海交通大学金相专业一位学生被划为右派的一条罪行是反苏，缘于有人揭发他“看苏联电影时打瞌睡”。

吉安师范聂福田，则因为其妻子漂亮，校长为达夺妻之目的，把聂打成“右派”。最终校长如愿以偿。

### 右派遭遇多惨烈？

复旦大学右派学生、后来官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的诸国本先生说：

**反右派斗争好像一只巨大的手，把一颗年青的、鲜活的、激烈跳动的、心脏紧紧掐住，直至死亡。**（诸国本《春天的落叶》新浪博客）

由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右派中，除极个别如章伯钧、章乃器等头面人物被“养起来”，极少数如冯雪峰、陆侃如等被留原单位改造外，绝大多数都被强行送到边疆、山区、农村及沙漠，在寒冷、贫瘠、气候恶劣、环境极为艰苦的地方服苦役。

根据劳改基金会出版的《劳改手册（2007—2008）》的不完全收集，整个中国大陆至少有 1,415 个劳改单位（农场、林场、工厂、矿山等），每个单位关押人数从数百到几万不等。右派们长期遭受到残酷迫害，被枪杀、被打死、被饿死，被病死，被累死，还有为数不少的人被自杀；从乡村僻壤到中央机关都有大量非正常死亡。这些劳改场所堪称中共集体屠杀知识份子、实行群体绝灭的集中营、屠宰场。

据中直党委 1957 年 10 月 19 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报告说：“截至 10 月 14 日为止，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共搞出右派分子 263 人，其中党员 111 人，团员 43 人，非党团员 109 人；其中骨干分子 20 人，已登报的 63 人，自杀的 9 人，死 5 人。”“皇帝脚下”尚且如此，皇城以外更是地狱矣。

浙江省龙泉县“河村农场”也是一个魔窟，1959 年一次大火，就烧死了 130 个右派分子。

关押了 3,106 人的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由于刻意饥饿、超体力超强度劳役、酷寒天气、精神和心理的摧残，以致在农场撤销的 1960 年，只有几百人存活下来，死亡率达 90%。

青海省第二大农场香日德农场 4 万多劳改、劳教犯，三年人祸过后，只剩两千多人。死亡率达 95%。

辽宁省凌源县新生焦化厂的一个 300 人右派劳改中队死了 227 人，死亡率达

75%！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大饥荒后，1,200 名右派、犯人饿死 1,000 人，没有饿死的 200 人中的 198 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勉强能下床走动。最后还是被饿死。死亡率 100%！

中共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1957.9.11)是这样说的：特别是在各市，对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职员中的右派分子还没有充分的揭发和暴露。如各市 617 名右派分子中，高级知识分子只占 19 名；唐山市的开滦，启新等大厂矿，至今尚未抓住一个像样的右派分子；张家口市铁路局、地质局、下花园发电厂等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集中的单位，现在揭发出来的 13 名右派分子都是一些会计员、过秤员、话务员、办事员和科员、交书、练习生之类，而高级知识分子却一个也没有……字里行间，透着对本国本民族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的仇恨，意欲赶尽杀绝、除之而后快！

“新中国”70 年中，没有出现一个大师、没有培养出一个经济类或科技类的诺贝尔奖得主，反右打手可谓“居功至伟”！

古今中外，找不出第二个国家、第二个皇帝（总统、主席）、第二个政党或政府这样大规模、丧心病狂地戕害自己的子民！

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被株连九族，祸连几代；许多人妻离子散、许多人家破人亡。

在 1979 年以后只有 55 万人得到所谓“纠正”；即使被“纠正”，也只是得到一张《改正通知书》，受害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施害者至今不肯道歉，也没有悔改的意思。更有甚者，这段历史被刻意隐瞒、篡改，受害者几乎完全“消失”，维权者遭到威胁恐吓，甚至专政工具的打压。

“毛太阳”是古今中外最高明整人大师，几十年来不断整人杀人，不知道毁灭了多少仁人志士，但他也是全中国最伟大的反革命家属，因为他的“革命伴侣”江青同志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他死后一个多月，江青就被逮捕，正应了那句古话“尸骨未寒，而妻孥不保”！毛泽东及其同伙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行，必须被彻底清算！其余各阶层施害者，也必须受到追究，不惩罚罪恶，就不能发扬真善美！

借运动心怀鬼胎整人的人，多都不得好死或早亡。右派高恒曾亲手帮助培养的一位青年干部，文革中竟出卖良心，狠整高恒；“改正”后，高恒不计前嫌地特意去牡丹江市看他，任该市办公室主任的这个青年干部红着脸道歉，后来不到 60 岁就去世了，高连声感叹：“太年轻，太可惜了！他很有才，幸亏我早已原谅了他。”笔者尽管不相信善恶因果报应，但还是认为心理和生理有一定关系——人若心地歹毒、心境总是不得安宁，终会酿出大病。

为了对抗封杀和有意的遗忘，本人从 2007 年开始，在专家、朋友的启发和帮助下，为“人在历史中” <http://www.ziyouren.org/> 和岑超南先生主理的 57hk.com 网站编写《右派名录》，“大辞典”是这份义务工作的副产品；

目前还有许多困难，希望能得到朋友、专家、读者，特别是受难者、知情者

的继续支持、帮助和支援。在没有传真、电邮、扫描等现代通信工具情况下，地方给中央的很多“战况”只能通过电话报告和接收，“一字多音”、“一音多字”等原因，导致很多中央文件也写错，这需要堪误和钩沉。

### 体例

1)《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宗旨是“尊重历史、保留记忆”，故只摘录原始文献、资料，一般不作价值判断，人物贬褒；

2)本大辞典按姓氏拼音字母/笔划编排，可以用姓名做关键词来搜索；

3)以姓名或通用笔名为条目，继以生卒年、性别、字(号、别名、笔名、曾用名)、籍贯、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划为右派分子时的工作单位和职务(级别)、所属党派；无法确定之项目暂缺；少数有姓无名者，只要单位明确，且有见证人的，亦予列入，俟知情人补充；

4)按编年列入主要经历、主要译著作品，采“有资料则长，无资料则短”的原则，虽有不公平之憾，亦属无奈；

5)主要言论、重要文件或摘要写入“条目”中，或作为附件列于条目之后；其中许多资料是来自宋永毅教授主编的《1957—中国反右派运动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公开的档案以及互联网，特此向有关人士和单位表示感谢。

6)所有资料均有所本，或由当事人、知情人直接提供，或摘自有关记实文章、《回忆录》；并注明来源或主要来源；

7)所有资料虽经初步比对、校勘，但因年代久远，记忆失真，资料或滥或缺，难免有讹漏，故请知情者不吝教正；

8)对本《名录》的意见、指正或赐赠资料、文件、书籍、照片、信函者，请发送至 Email：[wuys099@gmail.com](mailto:wuys099@gmail.com)。

各位新知旧雨，这本痛史中有你受难亲友的姓名吗？如果遗漏了，请联系我补充，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多留一点记忆！

《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编辑小组

执笔人武宜三

执行机构

人文资料出版中心

香港五七学社

[wuys099@gmail.com](mailto:wuys099@gmail.com)

852—95733657

谢谢大家！

2009.5.18 初稿

2020.7.9 修订